

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之影響探討

張秀玉

壹、前言

社會工作的價值觀一向強調個人在擁有適當的資源狀況下，均有能力成長與改變（許臨高等人譯，一九九九）。因此，社會工作在進行各種處置時，藉由個人能力與環境資源之間平等關係的創造，協助案主得以瞭解自己本就具備的能力與資源，並且激發案主的潛能以解決所面臨的困境，一直是社會工作的工作重點。但是，許多的文獻（Weick, Rapp, Sullivan & Kisthardt, 1989; Cowger, 1994; Chapin, 1995; Saleebey, 1996; Rapp, 1998; Early & GlenMaye, 2000; Brun & Rapp, 2001; Cowger & Snively, 2002）都提出，社會工作在實務處置或是政策設計上都仍偏向以病理觀點（Pathology Perspective）來診斷案主的問題。除了在實務處置上，特別著重於發現案主的缺陷或不足之處，而忽略了案主的力量與優勢的研判；在政策設計時也只針對案主需要補救的部分加以協助，而忽

略了運用或是加強原先就存在於案主環境中的正式與非正式資源。社會工作力量觀點（Strength Perspective）採取了一個與病理觀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案主與他的問題。但是，這並不代表力量觀點是較病理觀點為佳的處置方式，而是兩者各自擁有一套看待案主與其問題的獨特信念，也就是兩者具有不同的思考典範（paradigm）（Goldstein, 1990）。

社會工作力量觀點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解決問題的力量與資源，並且具有在困難環境中生存下來的復原力量（resilience）（Saleebey, 1996; Rapp, 1998; De Jong & Miller, 1995）。對於問題（problem）的界定，則將其視為案主本身的需求與環境的資源之間，產生分配錯誤或是不均衡的狀況，此種狀況使得案主在面對目前的困境時，覺得困惑或是痛苦（Cowger & Snively, 2002）。因此，社會工作者在協助案主時，必須創造一個脈絡（context），協助案主發覺自己的力量與資源，並釐清是何種障礙在影響這些力量的運作，社會工作者並與案主結合個人與環境中可能的資源，破除這些

障礙並發揮力量的影響力，問題便能由另一個角度來解決（黃鈴翔，張意真譯，一九九九；Cowger, 1994; Saleebey, 1996; Rapp, 1998; Brun & Rapp, 2001; Cowger & Snively, 2002）。

過去實務工作者從問題、診斷出發的處置觀點，限制了案主看到自己與環境權力間互動的可能性，並且忽視了在社會環境層面，本身所存在的權力關係不對等的情况，容易視案主為問題的製造者，傾向於責難於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周玟琪、葉琇珊等人譯，一九九五；趙善如，一九九九；Saleebey, 1996; Rapp, 1998; Cowger & Snively, 2002）。所以，社會工作力量觀點將案主的困境定義為個人與環境資源之間配合不當所產生，處置的重點則放在協助案主發現並運用自己的力量，同時針對案主與其社會環境進行增強權能的工作（Cowger, 1994; Saleebey, 1996; Rapp, 1998; Cowger & Snively, 2002）。這與社會工作強調協助個人發揮力量，達到自助、助人的助人目標相當契合。

身心障礙兒童由於其本身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加上年齡較小，不論在生活照顧與接受相關療育上，都必須依賴其家庭，家庭在照顧身心障礙兒童上便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周月清，一九九八；王國羽，二〇〇二；Freedman & Boyer, 2000）。在許多研究或文獻資料中（周月清，一九九八；Stainton & Besser, 1998; Theresa & GlenMaye, 2000）都指出，不論是普通人或是專業人員對家中有身心障礙兒童之家庭，常具有一些刻板印象，例如：家庭成員長期的悲痛；家庭在經濟、情感等層面的失功能；家庭成

員感情不睦的等等，對於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的正向影響則較少被討論，也忽略了身心障礙兒童家庭可能具有的力量與資源。若以社會工作力量觀點的角度來思考，在任何一種不利的環境之下，仍有支持個人面對困境的個人與環境的資源存在。因此，筆者希望藉由本文的探討，從社會工作力量觀點的角度切入，呈現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可能具有的正向影響；並且進一步從這些正向影響、力量（strengths）出發，提出對目前社會工作專業在協助家中有身心障礙兒童之家庭時，在實務工作上與政策上可以思考的方向。

貳、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之影響

當一個家庭中有身心障礙兒童時，若以病理與問題焦點的角度去提供服務時，我們可能將處置的重點放在這個案主與案家的弱點、缺點與問題上，像是：因為這個孩子的出現，使得家庭系統產生了轉變，這種轉變帶來家庭成員之間的緊張關係；為了協助身心障礙兒童接受療育，家庭經濟負擔可能提高，父母在照顧上的壓力加重；整個家庭深陷於擔心、恐懼與害怕中等等。當這些問題一一呈現時，社會工作者在進行處置時，自然容易將處置焦點放在如何協助案主或案家解決這些問題？而這種處置焦點也容易形塑案主、案家成為一個具有很多問題，卻沒有能力解決的「無助求助者」，可以想見的在專業關係中，社會工作者自然而然

便成為問題解決專家，而不是一位可以信任的伙伴（partner）或是協助者。

但若是以社會工作力量觀點的角度進行處置時，社會工作者可能將案主或案家視為一個獨特的個體，他可能擁有他人所沒有的特質、能力、資源或是優勢，因此，處置的焦點就會集中在發掘案主與案家的能力與資源。社會工作者也就會重視案主與案家對於自己目前問題困境的看法，由於這個觀點視案主為改變問題的重要媒介，在這個過程中，案主也較容易發展出信任自己的能力，也較容易與社會工作者形成伙伴關係。運用社會工作力量觀點思考案主問題時，並不是要刻意忽略其痛苦或是不足之處，而是期待以另一種角度出發，協助案主以另一種態度去思考自己的問題與改變的機會，使得問題對於案主或其他人較不具威脅性，當威脅性降低時，案主與他人願意解決問題的動機便會提高（Saleebey, 1996）。

若以社會工作力量觀點的角度作出發，國外一些學者（Turnbull, 1985; Turnbull, Guess & Turnbull, 1988; Behr, 1990; 轉引自 Stainton & Besser, 1998; Stainton & Besser, 1998）藉由內容分析法與質性研究方法進行研究時，發現出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有下列幾部分的正向影響：

學習生活課程的機會增加。

家庭力量的來源：家庭凝聚力的增加。

精神與心靈層面資源的增加：更加瞭解生命的意義與目的；

孩子小小的進步，家庭成員大大的快樂。

個人的成長與成熟的來源：容忍度與深入瞭解的能力增加。

學習處理問題的特殊經驗與能力增加。

對於其他人和社區正向的協助。

人際、社會網絡與社區投入的擴大：與專業人員和服務的互動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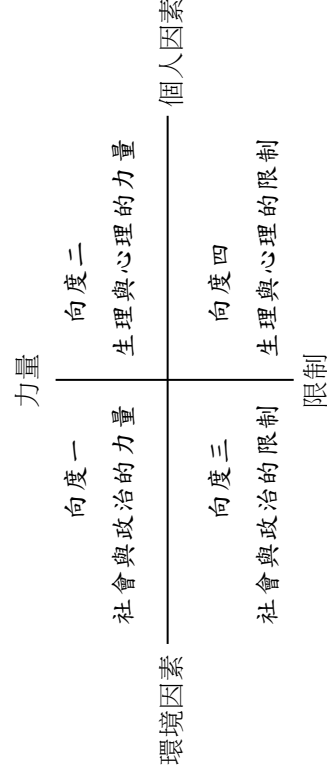
生涯或工作的成長：因為身心障礙兒童，使得家長成為身心障礙領域中之特殊教育、社會福利等專家。

重新評價家庭生活之目的與未來生活之優先性。

但在這些研究報告中，並沒有提到這些家庭是否具備了一些基本條件？才能感受到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有正向影響。因此，這也是筆者在閱讀這些文獻時，覺得由於缺乏這些先決條件的介紹，而使得研究結果在證據說服力上仍嫌不足之處。因為，即使運用社會工作力量觀點，來檢視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的正向影響時，必須先有一些基本變項的考量，像是：身心障礙兒童的障礙類型與程度；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本身具有的解決問題之動機強弱；家庭所在區域的外在資源與社會制度等等，這些先決條件可能必須從研究中做討論，這樣得出的結果可能會更具有實務參考之價值。不過，筆者仍引用這些研究報告的成果，主要是為了呈現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仍有一些正向影響，可提供社會工作在介入身心障礙領域時，從力量觀點提供服務可能性之思考。

社會工作力量觀點在進行案主問題研判（assessment）時，有其

社會工作力量觀點便是從個人與環境二個部分其各自的資源與限制進行問題研判，這裡所謂的限制是指社會工作者在協助案主運用其資源去解決其困境時，可能遇到的個人或環境的障礙。社會工作力量觀點在進行案主問題研判時，較著重於向度一與向度二的力量研



圖一 社會工作力量觀點的研判架構

資料來源：Cowger & Snively (2002)

研判的架構(詳圖一)，下文中，筆者將藉由此架構，將上文中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的正向影響，進行整理與分類。在圖一中，可以將社會工作力量觀點在研判案主問題時，分作個人與環境二個部分，其中個人的部分可以分為生理與心理二個部分。生理部分是指個人能夠執行日常生活的能力，像是身心障礙兒童本身的障礙類別與等級便會形成其生理優勢的不同；心理部分則是指案主可以突破困境的心理動機。

判。其中個人力量與限制部分，可以分為五個面向進行研判(Rapp, 1998)，分別是認知(cognition)、情緒(emotion)、動機(motivation)、因應(coping)、人際(interpersonal)，由於此部分並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所以並不詳細說明。

若針對上文中所探討的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之正向影響，可以依據案主個人與環境力量加以分類如下：

一、個人(家庭本身)力量部分

包括學習生活課程的機會增加；家庭力量的來源：家庭凝聚力的增加；精神與心靈層面資源的增加；更加瞭解生命的意義與目的；孩子小小的進步，家庭成員大大的快樂；個人的成長與成熟的來源；容忍度與深入瞭解的能力增加；學習處理問題的特殊經驗與能力增加。

一一、環境力量部分

其所具有的資源有哪些？也包括其所屬的政治文化環境中對於身心障礙兒童及其家庭可提供哪些正向支持與資源？在這個部分從上文的探討中，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之正向影響，屬於環境力量部分的有：對於其他人和社區正向的協助；人際、社會網絡與社區投入的擴大；認識更多專業人員和服務機構；生涯或工作的成長；因為身心障礙兒童，使得家長成為身心障礙領域中之特

殊教育、社會福利等專家，增加了與外界互動的資源並掌握更多的權力。

在進行案主問題研判時，除了注意案主個人與環境中的力量與資源之外，來自於政治或文化環境中的限制，像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不公平的資源分配等。社會工作者也都必須與案主一同檢視，以協助者、中介者（broker）的立場，瞭解案主對自己事實、資源與限制的瞭解與定義，相信案主，以增強權能、倡導的工作方法進行資源的連結與媒合，打破社會對身心障礙兒童與其家庭不合理的建構，也是社會工作力量觀點在進行問題研判與處置時的重點（Stone, 1984；Oliver, 1990; Cowger, 1994; Saleebey, 1996; Rapp, 1998; Cowger & Snively, 2002）。在上文中所探討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的正向影響，經過分類之後，可以發現家中有身心障礙兒童的家庭在家庭本身與環境上都有一些力量，當然也有一些力量是在這些文獻中並未呈現的，至於限制的部分，雖然並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但在進行實務處置與政策設計時也是必須考慮的重點。下文中，筆者也將針對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的正向影響，對目前身心障礙領域中社會工作實務與社會福利政策上，提出一些可供思考的面向。

參、對社會福利政策與社會工作實務之思考

經由上文的討論，可以發現以社會工作力量觀點去探討身心障

礙兒童對家庭的影響時，身心障礙兒童對於一個家庭而言，不見得全然就是無止盡的負擔與痛苦，從力量的角度來思考，可以看到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可能具有的正向影響，這些正向影響的發現，對於目前身心障礙領域在社會福利政策與社會工作實務上，可以提供不同角度的思考方向。

一、社會福利政策方面

政策設計上必須同時注意個人能力與環境資源之間的平衡關係

社會工作力量觀點所強調的是在討論案主所面臨的困境時，除了思考案主本身的資源與限制之外，來自於環境與社會的資源與限制，也必須是處置的重點。有些案主的問題是政治的，是社會所建構的；面對這樣的情形，社會工作的處置也必須是政治的，也必須考量如何在個人能力與環境、政治資源間運用協商（negotiate）的技巧來取得其平衡關係，若忽略了運用環境的力量，打破環境的限制，即使案主的力量不斷發現，有可能其能力與資源在面對強大的環境時，是無法運用的（Saleebey, 1996; Cowger & Snively, 2002）。

因此，在協助家中有身心障礙兒童的家庭時，也必須考量相關的社會制度與社會福利政策，是否有提供這些家庭正向的支援？還是在政策制訂中就已經限制了這些家庭發揮力量的可能性？Chapin

(1995)便指出美國身心障礙者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的內容中，便能看出其是以身心障礙者的力量觀點做出發，其強調提供身心障礙者相關的福利服務是其次的，如何協助身心障礙者獲得包含於(inclusion)社區的權力與機會，才是此法案設計的重點；所以整個法案中所呈現的是如何運用增強權能的方式，協助身心障礙者得到社區的資源以發揮自己的力量。這與社會工作力量觀點強調重視個人能力與環境資源之間的平衡關係的信念是一致的。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應考量對於家中有身心障礙兒童之家庭的支持與協助

反觀國內在八十六年修訂通過的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在法令中雖然也強調增加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的機會。但若是以近幾年來身心障礙國民生活狀況調查來看，至少九〇%以上的身心障礙者是居住在家中(王國羽，二〇〇二)。從身心障礙兒童由於年紀幼小，需要家庭成員的照顧來看，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中仍以身心障礙者為主要的受益對象(王國羽，二〇〇二)。對於家庭的支持與協助只有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四十一條有提到(為加強家庭照顧身心障礙者之意願及能力，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提供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下列服務：復健服務；心理諮詢；日間照顧；臨時及短期照顧餐飲服務；交通服務；休閒服務；親職教育；資訊提供；轉介服務；其他相關之社區服務)。由此可見，對於家庭的支持與協助並未在該法政策設計中(王國羽，二〇〇二)。

沒有法令的支持，相關的福利措施也很難具體、多面向的提供身心障礙家庭相關的資源與協助。這樣，國內對於家中有身心障礙兒童家庭之協助，若以法令與福利政策上來探討，提供的不是資源而是限制。所以在社會福利政策部分，不論是在政策設計、政策執行上，若以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的正向影響來思考，整個政策在設計與執行時是否有重視這些家庭的經驗與需求？在政策設計時是否可以從如何協助這些家庭有更多的正向資源支持，提高其發揮家庭的力量，降低環境的限制，將政策的目標設定在提供更多的資源與支持，協助這些家庭能獲得更多的生活機會，而不侷限在補救性的服務，也許是日後相關政策在修正時可以考慮的角度。

一、社會工作實務方面

就上文的探討，社會工作實務上若要以力量觀點提供身心障礙兒童與其家庭協助時，有下列幾個面向必須思考：

並不是所有案主的類型與問題狀況都適合運用力量觀點提供協助，進行問題研判時，需注意案主生理、心理與環境之資源和限制，並注意處置的原則。

社會工作者若要運用力量觀點協助家中有身心障礙兒童之家庭時，不僅能讓自己以正向的態度去面對家庭，更能夠由力量觀點的角度鼓勵案家以更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即將面臨的挑戰(Stainton &

Besser, 1998)。但是在運用力量的觀點之前，必須先考量目前家庭其遭遇困境所在的階段，也就是說如果家庭處於孩子剛被診斷為身心障礙兒童的階段時，其若處在情緒較激動的情況時，社會工作者必須先處理案家的情緒，協助其度過這個階段之後，才能進一步協助案家跳脫這些負面情境，瞭解自己的資源與能力，重新面對未來。因此，並不是所有家中有身心障礙兒童的家庭都適合運用力量的觀點來提供服務，需視案家所面臨困境的階段；此外，力量的觀點強調案主的經驗與語言分享，因此，對於部分無法表達自己需求與感受的案主或家庭成員，力量的觀點的運用會受到限制。不過，不論如何，力量的觀點仍可以提供社會工作者在進行處置時，一種正向、不責備的態度。

力量的觀點在進行案主問題之研判時，必須同時注意案主本身生理、心理與環境的資源與限制，對於身心障礙兒童而言，其生理、心理部分雖然有部分功能失能，但社會工作者也必須和其他家庭成員一同思考，除了失能的部分之外，是否也有部分生理與心理的功能是仍然可以發揮功能並加以運用的；也必須依循一些實務的處置原則（Cowger, 1994）：重視案主本身對於事實的瞭解；相信案主，認為案主是值得信賴的；發現與察覺案主需要的是什麼；研判必須同時著重個人與環境的力量；多面向的研判案主的力量；利用研判發現案主的獨特性；研判過程中需使用案主瞭解的語言；使研判成為案主與社會工作者共同參與的活動；社會工作者不能有秘密的研判；避免責備案主與他人；避免簡單因

果關係的思考；著重研判，而不是診斷。

重視案主的非正式資源

力量的觀點強調運用案主與環境的資源，來面對現在所遭遇的困境。力量除了包含案主本身的人格特質、生心理功能之外，也包括與案主相關的各個系統之間的正式與非正式資源。除了正式資源之外，學者Bennett & Deluca（1996）的研究也指出，身心障礙者家庭有下列幾項重要的非正式資源包括：家庭與朋友，家長團體；

目前已成為朋友的專業人員；宗教信仰。這些資源都可以視為案主與其環境的力量。

社會工作者的角色

力量的觀點強調重視案主對於問題與事實的瞭解及經驗。因此，在整個助人過程中，案主是問題改變的主要媒介，社會工作者扮演的角色已由病理觀點的專家，轉換成一位同伴、協助者、鼓勵者、中介者或使能者。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功能並不在於增強權能給案主，而是協助案主可以具有讓自己增強權能的能力（Cowger, 1994）。此外，社會工作者也必須擔任在案主個人能力與環境資源兩者之間的倡導者與協商者。例如：若是社會工作者發現一個家庭無法發現身心障礙兒童對其的正向意義，其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來自於案主或案家自己的能力與動機，而是來自於社會政策或制度的不完善時，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就必須轉換成政策的協商者、倡導者或鼓勵案家爭取權益的使能者。

肆、結論

社會工作力量觀點提供了一個與病理觀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的影響。藉由力量觀點的角度，也許可以提供社會工作在提供這些家庭相關的服務時，能夠以正向的眼光去看待其所在脈絡中的資源，並且與案家一同瞭解並運用這些來自於自身與環境中的資源，並且重新思考社會工作在看待需要協助之對象時，另一個可以切入的角度。

但是，力量觀點在運用時仍有其限制：由於其本身只提供一個研判、看待案主問題情境的思考架構，因為其只是一個觀點，缺乏明確的實務運作策略與技巧；案主在福利體制長期的暗示下，已經形塑自己是一個無能力需要專家協助的人。因此，社會工作者在運用力量觀點進行處置時，則必須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去解決這些社會文化對於案主的建構；社會工作者所服務的機構是否能夠接受這種服務方式，並提供社會工作者在時間與資源上的支持，也會影響力量觀點在實務上的運作；社會工作者本身的能力、知識與教育，能否支持其信任案主並發覺其力量；案主本身是否能夠自我接納、肯定來面對自己的力量限制等等，都是力量觀點在實務運作中所可能遭遇的困境。此外，筆者在參閱相關研究文獻時，對於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的影響之探討，只能找到國外的研究文獻，國內並沒有相關的資料或研究的報告，國外的經驗可供國內參考，但並不代表與國內的經驗就完全契

合，這也是本文的限制。

不過上述的限制，並不代表不能解決，反而提供了國內身心障礙領域有關的實務工作者與研究者，在後續工作與研究方向的提醒與參考。因此，筆者期待藉由本文提出以力量觀點這個不同於病理觀點的角度，所呈現身心障礙兒童對家庭之正向影響，能進一步引發在身心障礙領域中實務工作者與政策設計者，重新檢視自己對於身心障礙家庭是否也有一些負面的刻板印象？若是換個角度來看待他們，換個方法來研判他們的問題與需求，他們的生活與包含於社會的程度也許會比現在更好！

（本文作者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參考書目：

- 王國羽（二〇〇二）。我國身心障礙福利政策與體系——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的分析。社區發展季刊，九七，一一五——一二七。
- 周月清（一九九八）。身心障礙者福利與家庭社會工作——理論、實務與研究。臺北：五南。
- 周玟琪、葉琇珊等人譯（一九九五）。當代社會工作理論——批判的導論。臺北：五南。
- 許臨高等人譯（一九九九）。社會工作直接服務——理論與技巧（上）。臺北：洪葉。
- 黃鈴翔、張意真譯（一九九九）。開創生機——單親家庭權能增強社會

工作。臺北：亞太。

趙善如（一九九九）。「增強力量」觀點之社會工作實務要素與處遇策略。臺大社工學刊，1，113-116。

Bennett, T., & Deluca, D. A. (1996).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Positive adaptation across the life cycle. *Social Work in Education*, 18(1), 31-47.

Brun, C., & Rapp, R. C. (2001). Strengths-based case management: Individual's perspectives on strengths and the case manager relationship. *Social Work*, 46(3), 278-288.

Chapin, R. K. (1995). Social policy development: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Social Work*, 40(4), 506-515.

Cowger, C. D. (1994). Assessing client strengths: Clinical assessment for client empowerment. *Social Work*, 39(3), 262-268.

Cowger, C. D., & Snively, C. A. (2002). Assessing client strengths: Individual, family,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D. Saleebey(Ed.),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3rd ed.)(pp. 106-123). Boston: Allyn and Bacon.

De Jong, P., & Miller, S. D. (1995). How to interview for client strengths. *Social Work*, 40(6), 729-736.

Early, T.J., & GlenMaye, L. F.(2000). Valuing families: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families from a strengths perspective. *Social Work*, 45(2), 118-131.

Freedman, R. I., & Boyer, N. C. (2000). The power to choose: Supports for families caring for individuals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Health & Social Work*, 25(1), 59-69.

Goldstein, H.(1990). Strength or pathology: Ethnical and rhetorical contrasts in approaches to practice. *Family in Society*, 71(5), 267-275.

Oliver, M. (1990). *The Politics of Disablement: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N. Y. : Sr.Martin's Press.

Rapp, C. A. (1998). *The Strength Model: Case Management with People Suffering from Sever and Persistent Mental Ill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Saleebey, D. (1996). The strength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Extensions and cautions. *Social Work*, 41(3), 296-305.

Stainton, T., & Besser, H. (1998).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hildren with an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on the family. *Jounal of Intellectual &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23(1), 56-70.

Stone, D. A. (1984). *The Disable Stat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Weick, A., Rapp, C., Sullivan, W. P., & Kisthardt, W. (1989). A strength perspective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Work*, 34, 350-354.